

# 復健諮商專業倫理實踐的本土化考量

## Indigenous Considerations of Ethical Practice in the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Profession

張瑋珊<sup>1</sup>、郭淑梅<sup>2</sup>、王智弘<sup>3</sup>

Wei-Shan Chang<sup>1</sup>, Soo-Moy Koay<sup>2</sup>, Chih-Hung Wang<sup>3</sup>

### 摘要

復健諮商是支持身心障礙者達到其個人生涯與獨立生活目標之專業，復健諮商專業倫理的落實是復健諮商專業化過程中的重要條件。臺灣復健諮商專業與倫理守則之推動，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甚深，面對蘊藏西方價值觀的倫理守則，專業人員在實踐過程中需有對文化的敏感度，才能做出符合本土情境之倫理決策。本文主要分為三部分：首先從華人關係取向、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說明華人文化脈絡下的專業倫理實踐。接著說明復健諮商專業倫理議題與華人文化觀點的影響，包括復健諮商專業人員之資格與能力、身心障礙者的知後同意權、與身心障礙者家人及資源系統有關之雙重關係議題、服務身心障礙者之保密議題與隱私權考量。最後，嘗試歸納出華人文化觀點之復健諮商專業倫理內涵。本文期望能統整中西文化之復健諮商專業倫理觀點，作復健諮商專業人員倫理實踐、倫理教育者提升專業人員倫理能力之參考。

**關鍵詞：**復健諮商、復健諮商專業倫理、倫理實踐、華人文化、本土化

<sup>1,2</sup>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生

<sup>3</sup>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通訊作者：張瑋珊，（500）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1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E-mail: shan5433@gmail.com



## 壹、前言

復健諮商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始於1920年美國Smith-Fess法案提供傷殘退伍軍人返回職場，後擴展到以成年障礙者為對象的職業重建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服務，隨著復健過程的需求日趨複雜，復健諮商作為諮商、協調、整合專業資源以協助障礙者重返職場之專業角色也日受重視 (Shaw & Mascari, 2018)。復健諮商師 (Rehabilitation Counselor) 不僅運用個案管理模式提供職業重建服務，更強調諮商能力之發揮，透過心理、社會、職業與行為處遇及倡議，支持身心障礙者達到其個人生涯與獨立生活目標 (Leahy, 2018)。

臺灣復健諮商專業的起步較晚，以往有關身心障礙者的復健工作，較偏重醫療方面的服務，較忽略心理、社會、職業等層面之復健服務 (林幸台, 2007)。經多年之倡議，2003年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陸續成立復健諮商研究所，培育復健諮商專業人員，以因應國家發展及身心障礙者生活、教育、職業的需求。復健諮商專業訓練除了以碩士層級為定位，彰化師大、臺灣師大亦設立復健諮商學程，以培養大學層級復健諮商專業人才，並提升各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水準。惟高雄師大復健諮商研究所 (2024) 自2012年8月與「輔導與諮商研究所」整併為「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臺灣師大復健諮商研究所 (2024) 亦將於2024年8月起更名為「復健諮商與高齡福祉研究所」，復健諮商專業學程於2018年停招。

臺灣並無復健諮商師之專業認證，但勞政系統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 (以下簡稱職重)，可視為復健諮商

專業的具體實踐。隨著身心障礙者法規之制定與修正，可了解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日益受到重視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4)，2009年於各縣市全面設置「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窗口」，職重服務系統的建置逐漸完備。現階段臺灣之職重服務，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衛生福利部, 2021) 之定義，包括職重個案管理服務、職業輔導評量、職業訓練、就業服務、職務再設計、創業輔導及其他職重服務，其中負責整合職重服務資源之職重個案管理員，即類似美國復健諮商師於州政府職重部門的角色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4)。因此，本文所論述之臺灣復健諮商專業，乃職重人員所提供之職重服務為實質內涵。

復健諮商作為服務身心障礙者的專業，需重視專業倫理的實踐。美國復健諮商師認證委員會 (Commission on Rehabilitation Counselor Certification [CRCC]) 於1987年公布實施復健諮商師專業倫理守則 (Code of Professional Ethics for Rehabilitation Counselors [CPERC])，並歷經多次修訂以符合社會變遷 (CRCC, 2023)。臺灣職重服務倫理概念早期僅出現於社區化就業服務手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2002)，2009年臺灣全面推動職重窗口計畫後，凝聚職重專業人員的服務信念以提升專業服務品質，成為職重專業發展的重要任務，職重個案管理工作手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4) 中已提及專業倫理，但未訂定具體之守則，因此，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 ([職重協會], 2012) 於2012年成立「復健諮商倫理推動委員會」，並接受勞動部委託辦理「我國職業重建專業人員專業倫理守則探討計畫」 (職重協會, 2014)，據此訂定「身心障礙者職業重



建服務專業人員倫理守則」(勞動部, 2015)並於2015年公布實施,惟有待持續進行檢視與修訂。

職重服務為臺灣復健諮商專業最重要之具體實踐領域,其中專業倫理議題除受專業歷史演進與社會政策之影響,又與文化息息相關。早有學者提醒文化因素在復健諮商中的重要性(Mpofu et al., 2004; Weinrach & Thomas, 1998),考量專業倫理具備相對性、個別差異敏感性、情境敏感性與文化敏感性的特質,專業倫理守則與實踐應有本土化的考量(牛格正、王智弘, 2008; 王智弘、施丁仁, 2019),因此,臺灣復健諮商倫理進行本土化的考量有其必要性。

## 貳、助人專業倫理實踐的本土化考量

### 一、專業倫理實踐的本土化意識

受到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影響,諮商心理學的本土化是近年的重要議題,由於過去的心理學可說是含攝西方主流文化的心理學,因此,心理學本土化的方向主要是要建立含攝華人文化的心理學(黃光國, 2011),而諮商倫理的本土化則要含攝華人文化於倫理守則與實踐之中。

西方文化視諮商理論與諮商倫理為關係密切但彼此獨立,而華人文化的儒家助人觀點,則抱持著「專業與倫理合一觀」(王智弘, 2016, 2017, 2021; 黃艷禎, 2021),認為專業與倫理是一體的兩面,儒家的助人觀在於成己以成人,修己以安人,而儒家的倫理觀則在於盡己以推己,整體而言,儒家的助人目標在於追求中和之道:以自我修養為先、專業與倫理合一。此等文化差異對

專業倫理實踐的影響也一再呈現於實徵研究結果中(白倩如、何振宇, 2022; 田廣曉、王智弘, 2020; 陳秉華, 2003; 張勻銘等, 2012; 程雅好等, 2022; 楊佳穎, 2004; 楊淳斐, 1997)。因此,專業倫理實踐的文化因素考量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 二、專業倫理實踐的華人文化脈絡考量

在中華文化中,「倫理」一詞,依據儒家的解釋是以人與人的關係為基礎,是人際角色關係中互動行為的規範,「專業倫理」即專業人員的專業角色與他人互動行為的規範(牛格正、王智弘, 2008)。因此,從華人社會對人際關係的觀點,可探究專業人員於華人文化脈絡中的人際信念,如何影響其專業倫理的實踐。

相較於西方強調個人主義,華人社會則更受到關係主義(relationalism)的影響(Hwang, 1987),當代華人社會科學家、心理學家,都曾以儒家思想探討華人社會中人際關係的行為樣貌(陳秉華, 2003)。費孝通(1947)提出中國人「差序格局」的社會行為論,認為中國人的社會是以複雜的社會人際網絡為中心,社會結構如同石頭丟到水面時產生的一圈圈漣漪,每個人都按照特定的社會關係來作反應;楊國樞(Yang, 1981, 1995)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大環境特徵是父系傳承與階序結構,表現出家族取向、關係取向、權威取向、他人取向等心理與社會行為;黃光國(1985, 1993)於「人情與面子模式」中,提出從社會交換理論觀點提出華人在進行資源交換時,主要考量以「關係」作為判斷,人們會依對方所歸屬的關係類別,以不同的法則與之互動:第一種為「情感性



關係」，存在於最親近的初級團體；第二種為「工具性關係」，它位居人際關係最外層，依據「公平法則」互動；介於前面兩者間的是「混合性關係」，依照「人情法則」運作；陳秉華（2003）則提出「協調我」的概念，指個人能滿足自我的需要，也能照顧到社會關係中他人的需要，使個體達到兼顧自我與維持社會和諧的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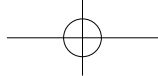
因此，在華人文化的人際關係中，除有親疏遠近之分，因關係深淺而有不同的互動規則，此為橫向之「親親法則」，也有強調下位者要以上為尊、縱向的權威關係與「尊尊法則」（許詩淇、葉光輝，2019），華人以「親疏」與「尊卑」二向度來建構角色規範，關係的親疏厚薄應從近親往外推行，但有另外的垂直「尊卑」向度，也是關係判斷的重要向度（莊耀嘉、楊國樞，1997），而在此縱、橫交錯的人際關係網絡法則下，個人如何取得平衡，是當代華人所面臨的課題。

華人關係主義文化會影響助人專業倫理之信念與行為，田廣曉與王智弘（2020）運用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黃光國，2010，2013；Hwang, 1987）對大陸地區大學諮商師雙重關係議題加以分析，研究發現華人社會相對於西方社會更易發生第二型雙重關係，即先有情感性關係再發生工具性關係；程雅好等（2022）發現華人輔導教師需考量多重角色、學生權益或學校行政裁示的雙情境脈絡，以及重視關係自我的華人文化，在三者交互影響下做出倫理專業判斷。白倩如與何振宇（2022）於社會工作倫理實踐困境的研究亦指出，華人講求多重關係互賴、禮尚往來的關係網建立，衝突處理講求表面和諧、不可計較，但私底下的利益計算則要加以平衡，而信任之建立則會受到身分和關係遠近

的影響。此等華人文化注重關係的特性，也易於衍生雙重關係的發生，如師生雙重關係的議題。大學師生雙重關係的調查研究發現（楊淳斐，1997），有超過半數（58.6%）的大專院校輔導老師認為師生雙重關係為「非常適當」或「適當」。此等接納師生雙重關係的現象，可能受到華人儒家文化對「師」的角色概念所影響，社會對「師」抱持學有專精的角色期待（陳秉華，2003），而諮商師正具有此等特性，而可能被服務對象視為老師（許雅惠，2009），使師生雙重關係，被當事人予以正向評價，並使發生的可能性提高。甚至有身處師生雙重關係的當事人，不只想保留此種關係，而且在諮商歷程中對人際界限也感到自在（楊佳穎，2004）。亦即雖然西方的諮商倫理信念對雙重關係的立場相對戒慎，而在華人文化兼顧社會關係與個人發展的現實生活考慮下，從原有的師生關係發展出諮商關係，卻有可能是合乎期待（張勻銘等，2012）。可見，華人文化中的人際關係信念確實會影響助人者的專業倫理信念與行為，即可能發生華人文化信念與西方專業倫理信念間差異與衝突之現象，此亦復健諮商專業倫理的重要議題。

### 三、「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與專業倫理實踐之本土化

西方專業倫理的核心強調當事人權益與助人者責任（牛格正、王智弘，2008；Corey et al., 2019; Kitchener, 1984）。華人文化的倫理觀，可從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作為倫理實踐的依據，《論語》之「克己復禮為仁」，指的是助人工作者的自省與自律，以此增進助人者的自我修為（沈清松，2000）。王智弘從華人文化的儒家觀點出發，並整合東



西文化的倫理觀點，建構「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The Duality Model of Professional Ethics for Helpers) (王智弘，2018；Wang, 2022) (如圖1)，西方專業倫理觀強調外在客觀的理性規範，以當事人五大權益為起點 (Kitchener, 1984)：諮商自主權、公平待遇權、諮商受益權、免受傷害權、要求忠誠權；進一步要求助人者善盡三大責任 (專業責任、倫理責任、法律責任) (牛格正、王智弘，2008；Corey et al., 2019)；華人文化倫理觀則強調內在主觀的自我修養，助人者先致力於自我修為 (先求盡己)，再進一步努力善待當事人 (再求推己)。以此「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探討專業倫理信念與行為，國內已有相關研究 (田廣曉、王智弘，2020；程雅好等，2022；黃艷禎，2021)，對專業倫理信念與行為之本土化探討，累積具有文化觀點的結果與發現。

莊謹鳳等人 (2024) 在專業倫理判斷之本土化研究中，探討性侵害議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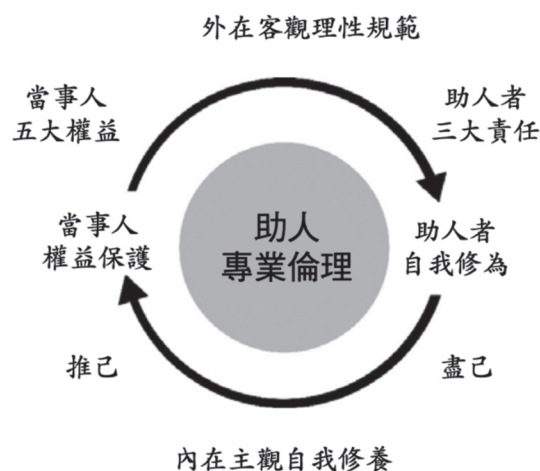
庭作證之倫理考量時，結合雙元模型與五級倫理判斷模式 (Van Hoose & Paradise, 1979)，而提出「心理師出庭之雙元倫理考量模型」(如圖2)。

Van Hoose 與 Paradise (1979) 五級倫理判斷模式之第一、二、三級層次 (獎懲、社會、機構導向) 為西方文化關注的外在客觀理性規範，屬「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之外元模型；第四、五層次 (個人、良心導向) 則屬於良心判斷，可以華人文化關注的內在主觀自我修為轉換倫理思維，亦即內元倫理。此研究在「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的基礎上，更完整描述倫理判斷的思維歷程，可作為助人者專業倫理實踐的重要參考。

臺灣復健諮商專業倫理目前是依據「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之規定而訂定，屬於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之外在客觀理性規範，專業人員在倫理判斷過程中若以獎懲、社會、機構導向原則，則為外元模

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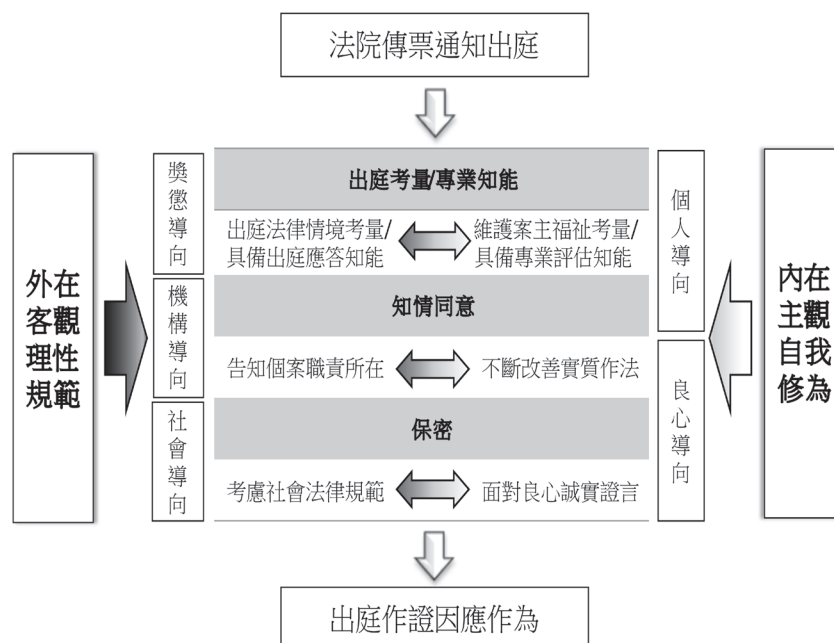
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



註：引自「諮商倫理議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王智弘，載於蕭文、田秀蘭 (主編)，**臺灣輔導一甲子** (356頁)，2018，心理。

圖2

心理師出庭之雙元倫理考量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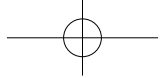
註：引自「心理師作為證人之本土化探討：性侵害議題出庭作證之倫理考量」，莊謹鳳、張素惠、程雅好、陳美伊、王智弘，2024，*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70，48頁。

型；若專業人員以之個案福祉與個人良心作為判斷準則，則為內在主觀自我修養層次。本文在探討臺灣復健諮商專業倫理之議題時，將以「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與「心理師出庭之雙元倫理考量模型」，作為探討復健諮商專業倫理的論述參考。

### 參、復健諮商專業倫理議題與華人文化考量

復健諮商面臨之倫理議題與其他諮商是相似的，但與障礙權利相關倫理責任和考慮因素（如個案的自主權、倡導和服務可及性），是需要特別關切的倫理議題（Hartley et al., 2021）。就CRCC受理的倫理諮詢案件進行探討，Cartwright與Hartley（2016）將1996年至

2013年間受理之倫理諮詢議題進行內容分析，比例最高之倫理議題分別為：1. 揭露（關於復健諮商師的專業能力、資格與服務，對專業團隊與雇主進行個案身心狀況、能力等的訊息揭露、個案可拒絕服務、職災賠償等法律議題等）；2. 法規（提供給符合資格者服務）；3. 保密（司法、專業服務人員一開始的權利告知）；4. 知情同意。Shaw與Lane（2008）則是分析1996年至2006年之CRCC倫理諮詢資料，其中以「揭露」比例最高，其次為保密、法律、知情同意、雙重角色和雇主關係。另一個研究則是以1993年至2006年間CRCC受理違反倫理行為之投訴案件為資料（Saunders et al., 2007），主要類別為：1. 對個案的能力與行為（如：遺棄、性親密、不誠實）；2. 商業行為（如：收費、報告、紀



錄)；3. 專業實務(如：結案與轉介、適當的就業機會、非專業關係)。從上述研究結果發現，CRCC復健諮商師的倫理諮詢需求以揭露、保密、法律與知情同意為主要議題；但個案所關切之倫理議題，則是雙重關係(性親密、非專業關係)、收費與受不公待遇(遺棄、不誠實、無法獲得就業機會等)，可見從專業人員與個案不同的立場，對倫理議題的諮詢需求有所差異。

若以復健諮商專業人員所面臨之倫理兩難或衝突研究，作為理解實務經驗中的倫理議題，可由Tarvydas與Barros-Bailey(2010)所調查之CRCC的240位復健諮商師常面臨的倫理衝突為例：1. 組織與付款人或雇主壓力間的衝突；2. 保密與保密的例外狀況；3. 自主權與個案的選擇；4. 個案關係；5. 同事間的違規；6. 其他；7. 歧視與倡導；8. 關於個案的違法或不誠實行為所涉及的法律問題；9. 利益衝突。此外，王柏軒(2016)進行臺灣職重人員之一——職業輔導評量員之倫理衝突調查發現，職業輔導評量員在考量個案最大利益時，常受限於機構限制。上述研究皆指出復健諮商專業人員面臨的主要倫理衝突，來自於個案與機構(或相關資源提供者)間的期待不一致，此可能與彼此的信念、文化背景有關，考驗復健諮商專業人員的價值判斷與倫理決定。以華人文化觀點檢視上述研究，當個案與機構之期待不同時，復健諮商專業人員如何考量「關係」之影響，以及以「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之外元或內元層次進行倫理判斷，值得加以探討。

本研究採取適用於本土諮商心理學研究取向之研究方法論(王智弘，2023)：Bhaskar(2008)的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與黃光國(Hwang, 2019)的含攝文化知識論策略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for constructing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以進行理論建構，因此，綜合含攝華人文化之倫理觀(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心理師出庭之雙元倫理考量模型)(王智弘，2018；田廣曉、王智弘，2020；程雅好等人，2022；莊謹鳳等人，2021，2024；Wang, 2022)，與西方的倫理觀(Kitchener, 1984; Van Hoose & Paradise, 1979)並納入國內外復健諮商重要倫理議題、身心障礙者職重服務專業人員倫理守則(勞動部，2015)，以建構本土化的「復健諮商專業倫理考量之雙元模型」(圖3)，後續則可再進行實徵研究之經驗驗證(empirical-testing)，以確認理論之真實(real)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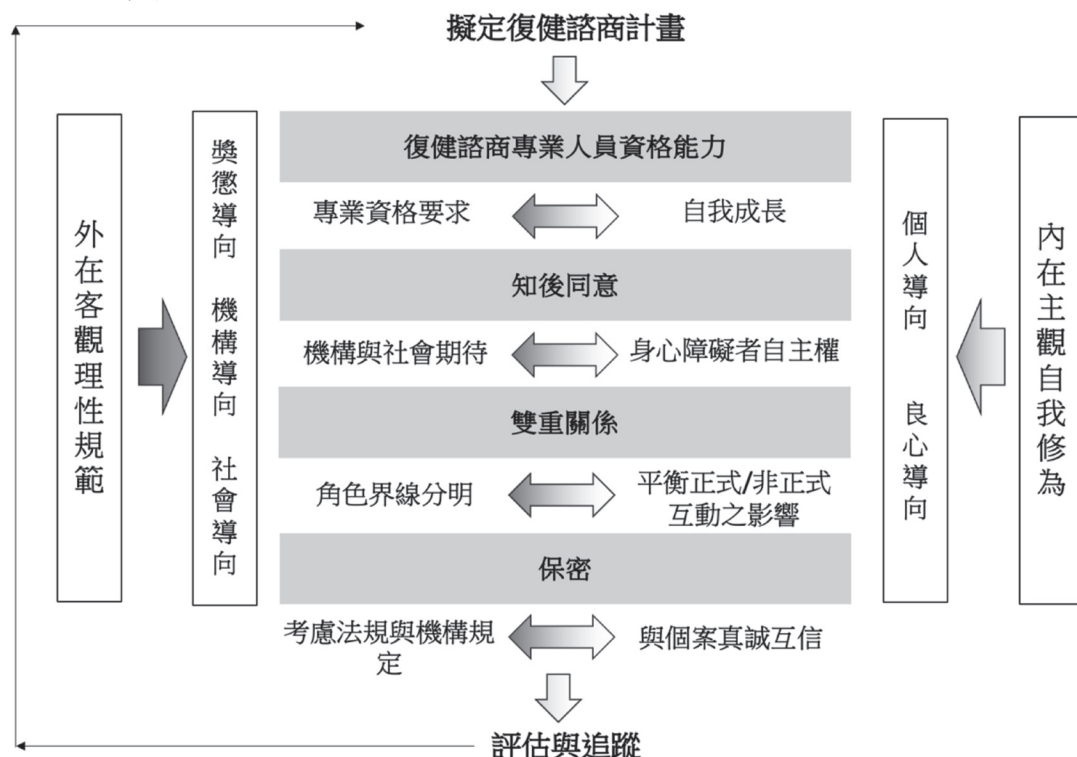
以臺灣職重服務流程為時間軸，從擬定職重服務計畫開始，歸納可能出現的主要倫理議題：復健諮商專業人員之資格與能力、身心障礙者的自主權與知後同意、與身心障礙者家人及資源系統有關之雙重關係議題、服務身心障礙者之保密議題與隱私權考量。並探討華人關係文化對倫理信念之影響，以及職重專業人員如何在外在客觀理性規範、內在主觀自我修為間進行倫理考量，以下依序進行探討：

## 一、復健諮商專業人員之資格與能力

助人專業工作者需要具備專業資格能力、維持專業成長，才能勝任專業服務工作，善盡「專業責任」(牛格正、王智弘，2008)。美國復健諮商師是由復健諮商師認證委員會(CRCC)進行資格認證，須具備的專業能力包括：評估、診斷與治療計畫、生涯(職業)諮商、個人和團體諮商(著重調整障礙帶來的生心理影響)、個案管理、轉介與服

圖3

復健諮商專業倫理考量之雙元模型



務協調、方案評估和研究、提供消除環境、就業和態度障礙的措施、進行系統間服務的諮詢、工作分析、開發與安置、提供如何獲得復健科技的諮詢等 (CRCC, 2021)。臺灣職重專業人員為落實復健諮商專業知能之主要角色，職重專業人員之資格認證是以「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勞動部, 2023)為依據，該準則明訂各類職重專業人員所需資格條件、專業訓練、繼續教育內容。以臺灣職重個案管理員與美國復健諮商師角色功能進行比較，兩者同樣須具備諮詢、評估、擬定計畫、個案管理、連結資源之能力，但在職業諮商、諮商介入、倡導、研究等面向，臺灣法規中目前並未有明確的規定與要求(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4)。面對身心障礙者複雜的就業

議題，職重專業人員除了符合法規的專業資格要求，提供符合標準的服務，更重要的是持續的自我成長，才能增進身心障礙者最大的就業權益。在圖1之「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王智弘, 2018; Wang, 2022)中所提到的「盡己」，即強調華人助人工作者的自覺自省的「自我修為」能力，才能修己以安人，依循良知促進社會與當事人福祉，達到「推己」之目標。在莊謹鳳等(2024)針對為性侵受害人出庭作證之心理師進行倫理考量之研究，發現心理師會經歷內在良心掙扎及外在法律服從的過程；在提供法院報告時亦會面臨當事人權益、個人因素之內在考量及法律、社會之外在責任(莊謹鳳等, 2021)。因此，以「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作為推動復健諮商專業倫理守則之啟示，除了以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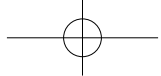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在客觀理性標準作為復健諮商專業人員倫理責任之基本要求，更可透過教育建立倫理意識，以內省喚起復健諮商專業人員內在良知，為促進當事人福祉而努力。

## 二、身心障礙者的知後同意權

知後同意權是基於當事人的自主選擇與決定權，在倫理的意義則是尊重當事人的自主權（牛格正、王智弘，2008）。當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揭示了身心障礙者應享有人權與基本自由，並有公平參與機會，人權觀點已成為普世價值，其中「確認身心障礙者個人自主與自立之重要性，作出自己選擇之自由」之理念與知後同意權的概念是一致的。復健諮商專業人員所服務的身心障礙者，過去在社會刻板印象下，常被認為是依賴他人、無法自我決定的。特別是認知障礙類的身心障礙者，其認知的損傷影響到對事物的記憶、理解與判斷，常被保護及取代決定權，社會制度與服務也忽略其主體性與自主權（王育瑜、林惠芳，2019）；Forester-Miller與Davis（2016）也認為智能障礙者缺乏做出正確和理性決定的能力，不應允許他們做出可能傷害自己或他人的決定。在Fields與Calvert（2015）搜尋1975年至2014年間與「informed consent（知後同意）」與「cognitive impairment（認知損傷）」學術文章與倫理規範中發現，認知損傷者獲得知情同意是困難的，因為服務提供者在保護個案與維護個案自主權間常產生倫理兩難。不僅是認知功能障礙者，其他身心障礙者亦有自主權的困境，如：感官功能障礙者（如聽覺、視覺障礙

）因為接收、表達訊息的方式受到影響，形成與他人互動的阻礙，容易在未充分理解與表達的情況下，無法真正進行自我決定。上述對障礙者的看法來自於西方早期的慈善或醫療觀點，常將障礙者排除在社會之外，直到近年來人權意識興起，障礙者的自主權才開始受到重視（張恒豪、蘇峰山，2019）。在華人文化中，可從《禮記》〈禮運大同篇〉之「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了解社會對障礙者的看法，認為障礙者是需要照顧的，但如何提供其所需要的照顧，亦涉及障礙者的想法與意願；此外，在華人文化的權威取向，障礙者及其家人容易認為專業人員即是解決問題的專家，或專業人員亦認為自己是專家，可能忽略了讓個案自我決定的機會，產生權力不平等的現象。

其次，當障礙者的生涯決定與家人、雇主或資源提供者不同或產生衝突時，專業人員的判斷與考量將受到挑戰。障礙者對服務的使用態度、就業動機與工作態度等，常受到其重要他人所影響，尤以家人為甚（許素彬等，2015），以職業選擇為例，當個案期待的職業類型與家人考量不同時，專業人員需要考量個案的意願，或配合家人期待，或在權衡過程中有更適當的決定。除了與家人期待的差異，在Tarvydas與Barros-Bailey（2010）的研究發現，復健諮商師最大的倫理衝突來自於需要平衡諮商師、雇主、主管或付款人的最大利益，如為了節省服務成本，即使個案尚未完全做好就業準備，也須盡快回到職場。有時因污名化的影響，限制了障礙者的就業選擇，如以整體社會安全為訴求，限縮精神障礙者個人的權利來保障眾人的利益（童伊迪，2013）。當西方觀點強調服務障礙者的過程中，進行適當的評估以協助他們表達自己的需求、想法，



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服务决定 (Fields et al., 2015) 是重要的；但在华人文化脉络下，个案可能更容易受到家族取向影响而配合家人决定，专业人员可能受到权威取向影响，而优先考量机构或上位者的决定。因此，在个案、家人、雇主、机构间进行沟通协调，以达到个案最大福祉，是华人复健谘商专业人员的一大挑战。

### 三、與身心障礙者家人及資源系統有關之雙重關係議題

雙重關係是指在助人專業人員與當事人進行諮商或心理治療工作時，同時或連續扮演兩種以上的角色，或與當事人有諮商關係之外的關係 (牛格正、王智弘, 2008)。避免雙重關係是因為可能會影響專業判斷，造成當事人的傷害。復健諮商人員為了與個案維繫合作關係、倡導障礙者權益、連結資源以協助其社區參與等，可能會有專業關係以外之互動，如：受邀觀賞障礙者演出、障礙者家人為表達感謝而送禮、幫助廠商宣傳或銷售產品以創造障礙者就業機會等。當服務過程中發生此類狀況，應覺察這些專業關係外的互動對服務的影響。諮商師與個案的非專業互動或關係類別中 (性或親密關係除外)，有些是潛在而有益的互動 (Cottone, 2010)，應禁止的並非雙重關係，而是因雙重關係而產生對個案的剝削與傷害 (牛格正、王智弘, 2008)。在考量「關係法則」的華人文化中，雙重關係是難以避免卻要留意其影響的議題，尤其是接受個案的回報、與個案的非正式互動，有時反而改變了親疏距離、緣份深淺，產生更良性的合作默契。因此，動態評估雙重關係的影響，釐清彼此的期待，是復健諮商人員需要保持敏感度的議題。

### 四、服務身心障礙者之保密議題與隱私權考量

保密影響著個案與助人工作者間的信任關係，也是助人工作者最常面臨與最多困難的倫理議題 (盧怡任、王智弘, 2012)。障礙者受到家庭系統影響，為了與家人充分合作，復健諮商人員對服務內容的保密與例外狀況，需要先與個案本人說明清楚。同時，復健諮商服務系統需要多位專業人員共同參與，在臺灣職重服務中，當職重個案管理員進行障礙者特質與職業方向初步評估後，可能須轉介職業輔導評量員進行深度評估，完成職重服務計畫後，再轉由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媒合，或由職業訓練人員、就業諮商、就業準備團體等專業人員進行就業能力與態度之培養。在服務的合作關係中，復健諮商人員間是否真正落實對個案服務資料的保密，特別是在會議討論、文件傳送過程中對個案服務資料洩密風險的評估，都是需要慎重考量的。

同時，障礙揭露是障礙者求職與適應過程中的難題 (陳美利, 2010)。復健諮商專業人員在拓展障礙者就業機會時，需要與雇主充分合作，創造友善的職場支持環境，此時，適度讓雇主與職場自然支持者了解個案障礙狀況對工作表現的影響與需要的輔助，對其就業適應是重要的。在西方觀點中的保密倫理守則，蘊含著「人與人之間要保持清楚的個人界限，彼此不得隨意侵犯，要尊重每個人有隱私權與獨立性」的看法，但在華人文化中，個人的自我是處於所屬的關係中，尤其與家人間的界限較不清晰，對於保密是困難的。專業人員面對其他同儕、雇主時，亦有混和性關係的人情考量，是否因為過於堅持保密原



則而影響了彼此的合作關係，考驗復健諮商專業人員在保密原則與關係互動的掌握度。

## 肆、結語：華人文化觀點之復健諮商專業倫理

### 一、在「關係」與「個人」間取得平衡之倫理考量

來自於西方個人主義之復健諮商倫理，重視個人之自主權、隱私保護、清楚的界限，但置於華人文化的關係取向脈絡中，將使復健諮商專業人員面臨倫理決策時的兩難。加上身心障礙者的障礙特性，容易被認為是缺乏自主、依賴他人、需要其他資源支持，讓復健諮商專業人員在實踐專業倫理的過程中，更需敏察自身對障礙的觀點與可能的偏見。因此，具有文化觀的復健諮商專業倫理，必須涵納「關係」與「個人」的存在與平衡。復健諮商專業人員於服務障礙者的過程中，若能以此辨識、判斷倫理議題，覺察自身的倫理信念，將形成更適合本土情境之倫理決策。

### 二、以內在動機促進專業倫理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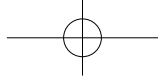
強調當事人權益與助人者責任之西方專業倫理，與華人文化中強調助人者內在主觀自我修為，對助人工作者有不同層次的影響。美國復健諮商專業倫理由「美國復健諮商師認證委員會」公告與執行，臺灣職重專業倫理由「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擬定並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公布實施，無論是專業協會、政府部門，若僅由外在控制規範專業倫理，專業人員恐落入擔心違規、受罰而遵守倫理守則之理性層次。在推動復健

諮商專業倫理的過程中，除了有外在規範的提醒與約束，更重要的是透過教育訓練過程，持續培養復健諮商專業人員對身心障礙者之關懷與理解之內在動機，真正體會專業倫理所蘊含的對人之尊重，從提升自身的品格做起，持續自我修為，進一步深化專業倫理之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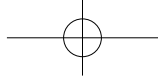
臺灣復健諮商專業的發展已達二十年，復健諮商專業倫理之訂定與推動亦將近十年，如何持續提升復健諮商服務之品質，可從復健諮商專業倫理之教育作專業化的立基點。復健諮商專業倫理之實踐，將華人文化觀點涵納於西方思維的倫理守則中，於「關係」與「個人」取向間取得平衡，並於制定外在規範的同時，提升專業人員內在動機、自我修為，透過專業倫理之實踐，達到促進身心障礙者福祉之終極目標。

## 參考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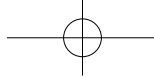
- 牛格正、王智弘（2008）。助人專業倫理。心靈工坊。
- 王育瑜、林惠芳（2019）。自我倡導。載於王國羽、林昭吟、張恒豪（主編），障礙研究與社會政策（頁185-207）。巨流。
- 王柏軒（2016）。職業輔導評量員之倫理衝突與倫理判斷傾向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 王智弘（2016）。含攝儒家功夫論的本土專業倫理觀：從助人倫理雙元模型談儒家的倫理自我修為之道。台灣心理諮商季刊，8（2），vi-xii。http://jicp.heart.net.tw/article/TCQ8-2-01.pdf
- 王智弘（2017）。探索華人本土諮商心理學的理论基礎：以儒家的諮商觀點為例。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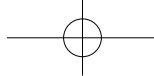
- 2) , vii-x。 <http://jicp.heart.net.tw/article/JICP9-2-1.pdf>
- 王智弘 (2018)。諮商倫理議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載於蕭文、田秀蘭 (主編)，**臺灣輔導一甲子** (頁 335-368)，心理。
- 王智弘 (2021)。助人關係中的療癒與倫理：文化中的治療實務反思與本土理論展望。**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12** (2)，vi-x。 <http://jicp.heart.net.tw/article/JICP12-2-01.pdf>
- 王智弘 (2023)。如何善用東西文化以開展本土化研究：以建構含攝文化理論的知識論策略與本土社會科學創造詮釋學為工具。**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14** (1)，vi-xx。
- 王智弘、施丁仁 (2019)。員工協助方案本土化：從倫理開始。**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10** (1)，31-37。
- 白倩如、何振宇 (2022)。華人陽/陰默認文化與社會工作規則倫理實踐之困境。**社區發展季刊**，**180**，115-128。 <https://cdj.sfaa.gov.tw/Journal/Content?gno=12953>
- 田廣曉、王智弘 (2020)。大陸地區大學諮商師涉及雙重關係倫理議題之本土化探討。**本土心理學研究**，**54**，113-176。 [https://doi.org/10.6254/IPRCS.202012\\_\(54\).0003](https://doi.org/10.6254/IPRCS.202012_(54).0003)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2002)。 **社區化就業服務工作手冊**。 [https://vrrc.heart.net.tw/download.php?action=view&dod\\_no=1426497683&dom\\_no=137](https://vrrc.heart.net.tw/download.php?action=view&dod_no=1426497683&dom_no=137)
- 沈清松 (2000)。台灣社會價值體系的今後走向。載於高朗 (主編)，**災後社會價值與倫理重建論文集** (頁 11-22)。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
- 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 (2012)。 **第3屆第5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http://www.tvra.artcom.tw/ap/news\\_view.aspx?bid=23&sn=dd3b091a-c28f-45a0-8571-13812a8c1a12](http://www.tvra.artcom.tw/ap/news_view.aspx?bid=23&sn=dd3b091a-c28f-45a0-8571-13812a8c1a12)
- 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 (2014)。 **第4屆第2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http://www.tvra.artcom.tw/ap/news\\_view.aspx?bid=23&sn=a5b7c88a-7097-406f-9ccd-f6a3576c7d87](http://www.tvra.artcom.tw/ap/news_view.aspx?bid=23&sn=a5b7c88a-7097-406f-9ccd-f6a3576c7d87)
- 林幸台 (2007)。復健諮商專業人員角色定位之研究。**復健諮商**，**1**，1-16。 <https://doi.org/10.30123/RC.200706.0002>
- 張勻銘、王智弘、楊淳斐、李佳儒 (2012)。當事人和諮商師發展友誼關係之經驗：當事人觀點。**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5** (4)，633-658。 [http://dx.doi.org/10.30074/FJMH.201212\\_25\(4\).0005](http://dx.doi.org/10.30074/FJMH.201212_25(4).0005)
- 張恒豪、蘇峰山 (2019)。西方社會障礙歷史與文化。載於王國羽、林昭吟、張恒豪 (主編)，**障礙研究與社會政策** (頁1-26)。巨流。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2024)。 **本所概況—歷史沿革**。 <https://cprc.nknu.edu.tw/Page.aspx?PN=39&PClass=0002>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 (2024)。 **113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簡章公告**。 <https://www.girc.ntnu.edu.tw/index.php/admission1/>
- 陳秉華 (2003)。重建台灣/華人諮商倫理的文化思考。**亞洲輔導學報**，**10** (1)，11-23。 [https://hkier.cuhk.edu.hk/journal/document/AJC/ajc\\_v10n1\\_11-32.pdf](https://hkier.cuhk.edu.hk/journal/document/AJC/ajc_v10n1_11-32.pdf)
- 陳美利 (2010)。 **高職輕度智能障礙畢業生就業歷程之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許素彬、胡慧嫻、張秀玉 (2015)。身心障礙者就業性家庭支持服務的內涵與遞送分析：以臺中市為例。**臺大社工學刊**，**32**，133-176。 [http://www.tvra.artcom.tw/ap/news\\_view.aspx?bid=23&sn=dd3b091a-c28f-45a0-8571-13812a8c1a12](http://www.tvra.artcom.tw/ap/news_view.aspx?bid=23&sn=dd3b091a-c28f-45a0-8571-13812a8c1a12)



- dx.doi.org/10.6171/ntuswr2015.32.04
- 許雅惠 (2009)。台灣諮商人員諮商關係建構經驗之分析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6**，85-119。http://dx.doi.org/10.7082/CJGC.200909.0085
- 許詩淇、葉光輝 (2019)。華人人際及群際關係主題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本土心理學研究*，**51**，33-88。http://dx.doi.org/10.6254/IPRCS.201906\_(51).0002
- 莊謹鳳、張素惠、程雅好、王智弘 (2021)。性侵害案件中提供司法單位心理諮商報告之倫理考量。*輔導與諮商學報*，**43** (2)，89-119。http://dx.doi.org/10.3966/181815462021064302004
- 莊謹鳳、張素惠、程雅好、陳美伊、王智弘 (2024)。心理師作為證人之本土化探討：性侵害議題出庭作證之倫理考量。*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http://dx.doi.org/10.3966/181815462021064302004
- 莊耀嘉、楊國樞 (1997)。角色規範的認知結構。*本土心理學研究*，**7**，282-338。https://tpl.ncl.edu.tw/NclService/JournalContentDetail?SysId=A97034951
- 童伊迪 (2013)。誰的正義？從精神障礙者案主自決省思專業價值的實踐。*台灣醫學人文學刊*，**14** (1、2)，65-83。
- 黃光國 (1985)。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載於李亦園、楊國樞、文崇一主編，*現代化與中國化論文集*。桂冠。
- 黃光國 (1993)。互動論與社會交易：社會心理學本土化的方法論問題。*本土心理學研究*，**2**，94-142。http://dx.doi.org/10.6254/1993.2.94
- 黃光國 (2010)。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利遊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黃光國 (2011)。論「含攝文化的心理學」。 *本土心理學研究*，**36**，79-110。http://dx.doi.org/10.6254/2011.36.79
- 黃光國 (2013)。 *社會科學的理路* (第三版)。心理。
- 黃艷禎 (2021)。 *內聖外王：從儒家專業與倫理合一觀探討華人助人工作者的自我修為經驗*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 費孝通 (1947)。 *鄉土中國*。香港：文學。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4)。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工作手冊*。https://vrrc.heart.net.tw/download.php?action=view&dod\_no=1390455735&dom\_no=123
- 勞動部 (2015)。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倫理守則*。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2.aspx?id=FL077143
- 勞動部 (2023)。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80029
- 程雅好、張素惠、莊謹鳳、王智弘 (2022)。華人文化脈絡下高中職輔導教師多重角色衝突倫理判斷歷程之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65**，27-62。http://dx.doi.org/10.53106/172851862022090065002
- 楊佳穎 (2004)。 *師生諮商雙重關係之經驗探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 楊淳斐 (1997)。 *大專院校輔導教師諮商倫理信念與行為之調查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 衛生福利部 (2021)。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



- D0050046  
盧怡任、王智弘 (2012)。諮商心理師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之調查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3(4)，738-804。  
。 <http://dx.doi.org/10.6251/BEP.20110315>
- Bhaskar, R. (2008).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Routledge.
- Cartwright, B. Y., & Hartley, M. T. (2016). Ethics consultation in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A content analysis of CRCC advisory opinions, 1996-2013.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Bulletin*, 59(2), 84-93. <https://doi.org/10.1177/0034355215573537>
- Commission on Rehabilitation Counselor Certification (2021). *Certified Rehabilitation Counselor (CRC) Certification Guide*. <https://crccertifica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21/01/CRCCertificationGuide-2021.pdf>
- Commission on Rehabilitation Counselor Certification (2023). *Code of professional ethics for rehabilitation counselors*. <https://crccertifica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23/04/2023-Code-of-Ethics.pdf>
- Corey, G., Corey, M. S., & Corey, C. (2019). *Issues and ethics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10th ed.)*. Cengage Learning.
- Cottone, R. R. (2010).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with clients in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Beyond the concept of dual relationships.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Bulletin*, 53(4), 226-231. <https://doi.org/10.1177/0034355210368565>
- Fields, L. M., & Calvert, J. D. (2015). Informed consent procedures with cognitively impaired patients: A review of ethics and best practices.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 69(8), 421-471. <https://doi.org/10.1111/pcn.12289>
- Forester-Miller, H., & Davis, T. E. (2016). *Practitioner's guide to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Rev. ed.)*. <https://www.counseling.org/docs/default-source/ethics/practitioner-39-s-guide-to-ethical-decision-making.pdf?sfvrsn=10/1000>
- Hartley, M. T., Tarvydas, V. M., & Saia, T. A. (2021).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In Cottone, R. R., Tarvydas, V. M., & Hartley, M. T. (Eds.), *Eth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5th ed., pp. 209-234). Springer.
- Hwang, K. K. (1987).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4), 944-974. <https://doi.org/10.1086/228588>
- Hwang, K. K. (2019). *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itchener, K. S. (1984). Intuition,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ethical principles: The foundation for ethical decisions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12(3), 43-55. <https://doi.org/10.1177/0011000084123005>
- Leahy, M. J. (2018).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In Tarvydas, V. M., & Hartley, M. T. (Eds.), *The Professional Practice of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pringer.
- Mpofu, E., Beck, R., & Weinrach, S. G. (2004). Multicultural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In F. Chan, N. L. Berven, & K. R. Thomas (Eds.), *Counseling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for rehabilitation health professionals* (pp.386-402). Springer.
- Shaw, L., & Lane, F. J. (2008). Content



- analysis of the advisory opinion archive of the Commission on Rehabilitation Counselor Certification.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Bulletin* 51(3), 170-176. <https://doi.org/10.1177/0034355207311314>
- Shaw, L. R., & Mascari, J. B. (2018).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counseling and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In Tarvydas, V. M., & Hartley, M. T. (Eds.), *The Professional Practice of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pringer.vu4
- Tarvydas, V. M., & Barros-Bailey, M. (2010). Ethical dilemmas of rehabilitation counselors: Results of an international qualitative study. *Journal of Applied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41(2), 12-19. <https://doi.org/10.1177/0034355210368566>
- Van Hoose, W. H., & Paradise, L. V. (1979). *Ethics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Perspectives in issues and decision making*. Carroll Press.
- Wang, C. H. (2022). An inclusive theory of ethics based on Chinese culture: The Duality Model of Professional Ethics for Helpers. In A. K. Giri & S. C. Wu (Eds.) *Cross-currents of social theorizing of contemporary Taiwan* (pp. 187-206). Palgrave Macmillan.
- Weinrach, S. G., & Thomas, K. R. (1998). Diversity-sensitive counseling today: A postmodern clash of value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6, 115-122. <https://doi.org/10.1002/j.1556-6676.1998.tb02384.x>
- Yang, K. S. (1981). Social orientation and individual modernity among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13(2), 159-170. <https://doi.org/10.6342/NTU.2008.01248>
- Yang, K. S. (1995). Chinese social orientation: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In T. Y. Lin, W. S. Tseng, & T. Y. Yeh (Eds.), *Chinese societies and mental health* (pp. 19-3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投稿日期：112年10月03日

第一次修改日期：112年11月23日

第二次修改日期：113年02月16日

通過日期：113年04月12日

